社会照顾：作为社会政策研究的一种新兴范式

岳经纶　王桢钰 *

摘要：近年来，随着“一老一小”照顾问题上升为重要的国家政策关切，该问题逐渐外溢出私人（家庭）领域，成为社会政策实践与理论研究亟待回应的公共议题。西方学界关于照顾研究的重要理论启示在于，它批判了传统福利国家理论对性别视角的忽视及其潜在的性别分工假设，并指出主流社会政策过于聚焦国家与市场、劳动与福利的关系，而忽略了家庭照顾本身的价值以及承担这些责任的群体（主要是女性）的权利保障问题。社会照顾作为区别于（但并不相互排斥）社会保险的社会政策研究新兴范式，为重新思考福利制度与照顾责任的界限指明方向，而且为促进我国养老托育照顾政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它的政策意义在当前中国社会流动性增强、少子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更为凸显。

关键词：社会照顾；范式；养老托育；“一老一小”；中国社会福利制度
DOI:10.19506/j.cnki.cn10-1428/d.2026.04.008

一、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的同步加剧，在养老、育幼和支持困境成员方面，中国家庭面临的压力日益凸显：既要照料年迈长辈，又要抚育年幼子女，还要在残障人士、单亲家庭与失独家庭等情境下填补情感与照顾缺口。“谁来照顾、如何照顾”的问题愈发成为社会结构转型中的核心挑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流动性增强、家庭小型化与代际分居常态化、婚姻稳定性下降等变迁持续削弱了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照顾资源（岳经纶、范昕，2018）。“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老漂一族”等现象集中折射出照顾责任失衡所带来的结构性裂缝，并凸显出照顾责任从家庭向社会有序转移的制度紧迫性。

切实回应“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的社会期待，已不再是个体或家庭可以自行化解的个人困境，而是中国社会政策实践与学术研究亟须正面回应的公共议题（岳经纶，2022）。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一老一小”的保障和服务问题，先后出台《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 岳经纶：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桢钰（通信作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推进共同富裕的社会政策体系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22VRC182）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等政策，以回应家庭照顾功能弱化带来的制度缺口。202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提出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表明高质量发展也要求民生政策与社会治理同步升级。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一老一小”政策需要顺应养老育幼需求的变化，进一步提升政策供给质量与效能（顾严，2024）。因此，“照顾”成为了本土公共领域连接国家、社会与家庭的重要活动。

对照顾的关注，不仅关涉福利国家改革方向的规范性讨论，也为把握人类生活在宏观结构与微观互动中的运作机制提供了关键视角（Deacon，2007）。“照顾”（Care）这一通常指代对有需要的人士进行照料的活动，早已超越日常生活，成为西方政策辩论与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Daly & Lewis，2000）。然而，一方面，国内学界在照顾议题上的理论铺垫仍显不足，既缺少对照顾意涵与照顾体制的系统分析，也缺乏对西方照顾理论的有意识引介与在地化吸收，使当前“一老一小”等相关政策缺乏清晰而有力的概念工具与理论支撑。相较之下，西方学界关于照顾的研究已得到系统发展，其经验与反思对于当代中国积极应对“照顾赤字”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岳经纶、方萍，2017）。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经典社会政策或福利国家研究聚焦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Esping-Andersen，1990），尤其关注与就业相关的社会保险制度及其所保障的收入维持权，而相对忽视托育、长期照顾等社会服务体系的制度地位与发展路径。这种偏重收入维持与社会保险（或者说就业与福利）的研究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照顾制度的整体性理解（Lewis，1997）。据此，本文提出一系列核心追问：在西方学术领域，如何理解照顾活动在公私领域的演变？“社会照顾”何以可能成为一种具有解释力的社会政策研究范式，其内涵、边界与制度指向为何？相较于“社会保险”这一经典研究范式，二者在理论逻辑与政策功能上有何异同？作为新兴范式，“社会照顾”又将如何推动正在形成的“一老一小”政策体系及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

为回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西方关于“社会照顾”的相关讨论，引入并深化这一分析视角，尝试将“社会照顾”提升为一种社会政策研究新范式。文章首先介绍“照顾”由日常概念走向学术议题与政府议程的发展历程，继而阐明社会照顾的概念与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库恩（Kuhn，1970）的“范式”理论，回顾了经典福利国家研究所呈现的常规科学特征及其在照顾视角下所受到的质疑与批判，进一步考察社会照顾何以由最初的分析范畴逐步发展为社会政策研究范式。随后，通过与“社会保险”这一经典范式的比较，系统论证了“社会照顾”作为社会政策研究新范式的解释力与合理性，并阐明其与“社会保险”范式之间的互补关系。最后，本文进一步讨论了“社会照顾”对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启示，以期为“一老一小”政策体系建设及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设计提供理论支撑。

二、照顾：从日常活动到学术概念与政策工具

从传统社会结构看，受女性生理特征及其在家庭与社会中经济上相对依附、社会地位较低的影响，家庭照顾长期被视为女性“天赋”且“理所当然”的责任。在性别化分工的持续塑造下，照顾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被固化为私人领域事务，而非需要公共权力介入的社会议题。由此，照顾的私人化与性别固化不仅使相关理论研究与制度探索长期滞后，也使“照顾”这一看似无害且具有积极色彩的概念，逐渐成为社会理论、政策与实践中关键张力的来源（Rummery & Fine，2012）。

最早对“照顾”展开学术探讨的是西方的女性主义学者（Gilligan，1982；Orloff，1993）。这些学者关注照顾概念所蕴含的性别指向，尝试以“照顾”来刻画女性的生活处境与经验特征，将其与道德发展联系起来（Gilligan，1982），揭示了长期以来在社会分析中被忽视，却对社会运行至关重要的照顾与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性承担，且多以无偿形式存在的现实。起初学者关注的是照顾作为一种特殊劳动形态的双重属性：一方面，照顾劳动因其无偿性与情感性被赋予道德意义，既塑造了对女性道德角色的规范性期待，也成为性别不平等批判的重要切入点（Lewis，1992，1997）；另一方面，照顾责任的制度化分配加剧了女性在社会权利与资源分配中的结构性劣势（Orloff，1993）。早期女性主义研究将照顾主要理解为女性在家庭私人领域中的生活实践，其伦理意涵亦被赋予“无情世界里的避难所”中的“安慰天使”的象征意义（Lasch，1977）。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福利国家在经济增长、民主制度扩展、家庭结构多元化、人口老龄化与低生育率等多重变迁中不断调整其社会政策体系（Pierson，1996；Esping-Andersen，1999）。其中，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冲击了“男性养家、女性照顾家庭”的传统性别分工以及“女性即照顾者”的默认假设（Lewis，1997）。尽管科尔伯格认为，进入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女性从私人领域转向公共领域并获得实质收益（Kolberg，1991），但也有学者指出，民主制度和劳动参与本身并不会自动消除性别不平等（Siim，1994：288）。事实上，进入职场的女性在承担有偿工作的同时，往往仍需承担主要家庭照顾责任，这加剧了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冲突，并使照顾问题逐渐突破私人领域，成为福利国家必须回应的公共议题。在此背景下，政府开始通过多样化的制度安排介入并支持非正式照顾活动，欧洲福利国家的社会照顾服务迅速扩展，服务对象由传统弱势群体延伸至更广泛人群，服务内容也日趋多样化（Anttonen & Sipilä，1996；岳经纶、方萍，2017；Ciccia & Sainsbury，2018）。尽管不同国家受历史文化传统、政治意识形态与经济条件影响，在照顾政策上形成了公共化、社会化、市场化或再家庭化等不同路径，但公共权力持续介入并重塑国家、市场、社区与家庭之间照顾责任分配的总体趋势并未改变（Geissler & Pfau-Effinger，2005）。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在财政紧缩与福利国家重组背景下，许多欧洲国家在照顾领域逐渐强化“混合供给”取向。不同福利国家的政策路径有所差异：北欧国家更强调公共托育和社区照顾服务供给，以推动去家庭化；南欧及家庭主义传统较强的国家则长期依赖家庭照顾，但也在老龄化和新社会风险凸显后逐步推动长期照顾的制度化改革（Leitner，2003；Bettio & Plantenga，2004）。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提高带来的照顾压力，欧洲福利国家逐渐通过现金给付、照顾津贴和社会保险权益安排等方式，对家庭成员承担的非正式照顾劳动予以制度性认可，并推动了“照顾支出”（payments for care）与“有偿家庭照顾”（paid family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care）的政策发展（Leitner，2003；Eggers et al.，2024；Bei et al.，2026）。其中，欧洲多国所扩展的“以现金换取照顾服务”（cash-for-care）安排，使现金给付成为照顾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Ungerson & Yeandle，2007）。与此同时，照顾政策进一步延伸至时间安排和劳动保护，如照顾假、育儿假、弹性工作以及对家庭照顾者的支持政策等。近年来，照顾议题进一步被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 ILO）纳入体面劳动和性别平等的研究框架（ILO，2018）。欧盟层面也相继出台《欧洲社会权利支柱》（2017）、《工作—生活平衡指令》（2019）和《欧洲照顾战略》（2022）等文件，推动托育和长期护理进一步进入就业、性别平等和社会保障的主流政策议程。

由此可见，欧洲照顾政策的演进并非单纯扩大服务供给，而是在现金、时间与服务三类工具之间形成组合，以重新配置照顾责任并提升照顾劳动的制度可见性。表 1 归纳了欧洲国家对照顾领域的主要政策干预及其措施。

表 1 欧洲国家照顾干预的主要措施

政策工具	政策领域	主要政策措施
现金	收入	照顾津贴（cash-for-care）、产假津贴（maternity allowance）以及照顾者津贴（carer’s allowance）、儿童津贴（child allowance）、家庭津贴（family allowance/cash benefits）
时间	劳动时间安排	护理假条例（care leave regulations）、产假与陪产假（maternity and paternity leave）、带薪或不带薪的育儿假（paid or unpaid parental leave）、带薪或不带薪的照顾假（paid or unpaid care leave）、非全职工作（part-time working）、弹性工作（flexible working）、工作 - 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家庭友好型工作安排（family-friendly working arrangements）、减少工作时间（working time reductions）
服务	税收	支持家庭服务的劳动税收减免（labour tax deduction for domestic/household services）、对提供个人健康计划的税收减免（tax relief towards the provision of private health plans）
	家庭服务	居家帮助 / 护理（home helps/domiciliary care）、家庭 - 社区为本的支持服务（home-and community-based support services）、整合型（一站式）照顾服务（integrated care）、喘息服务（respite care）、技术性协助（technical assistance）
	市场服务	服务券 / 准服务券（service vouchers/quasi-vouchers）、社会照顾市场（social care markets）、个人预算（personal budget）
	设施服务	政府主办的日托 / 夜间照料中心（tax-funded day/night care centres）、护理院（nursing home）、长期护理机构（long-term care facility）
	培训 / 教育服务	产假和 / 或育儿假后的返岗职业咨询（career counselling）、父亲角色倡议（fatherhood initiative）、两性平等的社会规范（gender-equal social norms）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以及欧洲主要福利国家政府官网整理。

照顾一直在福利国家的政策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在当代日益成为福利国家活动的核心（Daly & Lewis，2000）。社会支出作为福利国家支持现金、时间及服务三类照顾政策工具的重要手段，持续重塑着国家、市场与家庭之间的照顾分工格局。经合组织（OECD）明确将社会支出定义为：“由公共和私人机构向家庭和个人提供的福利给付，以及面向家庭和个人的财政性资助，旨在其福利状况受到不利影响时提供支持；但前提是这些福利给付和财政性资助既不构成对某一特定商品或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服务的直接支付，也不属于个人合同或个人转移支付。”（Adema et al.，2011：90）在这一界定下，社会支出不仅包括养老金、产假收入支持和社会救助金等现金给付，也包括对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照顾等社会服务的支持，以及具有社会保护目的的税收减免或优惠政策。故社会支出本身就包含对照顾活动的制度性支持。以 OECD 国家的家庭福利支出占公共支出的平均变化情况为例，1981—2021 年，这一比例总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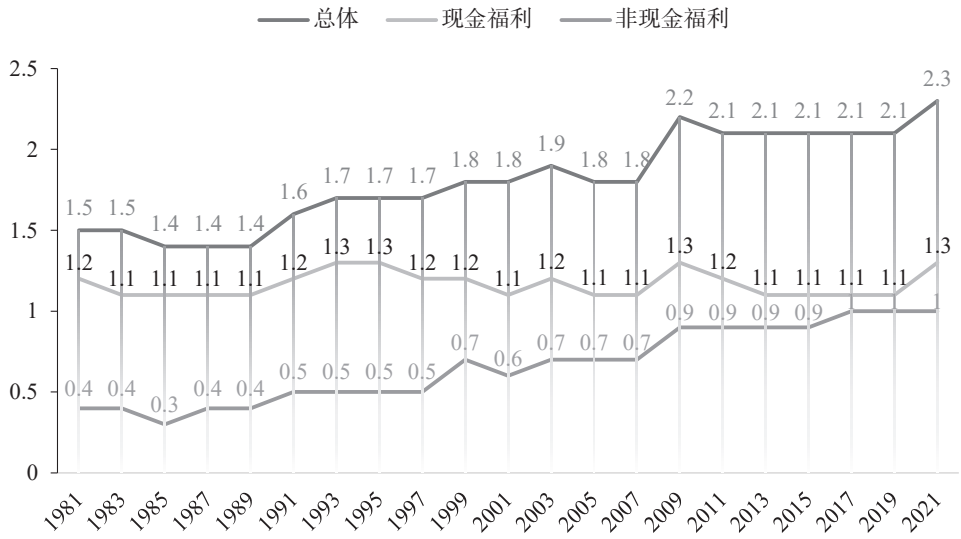


图 1　OECD 国家平均花费在家庭福利上的公共支出情况（1981—2021 年）

说明：家庭福利支出指的是公共支出在家庭福利上的投入（现金福利与服务提供），主要包括三类：与儿童有关的现金福利（cash benefits），包括儿童津贴、父母假期期间的收入、和对单亲家庭的现金资助；为育儿家庭提供的公共服务（benefits in kind），包括对儿童照料者和早教机构的资助或补贴、发放给父母的儿童照顾费用、对少年或老年照顾机构提供的资助、家庭服务支出（如机构服务或居家护理服务）；通过税收系统对育儿家庭提供的经济支持（financial support through the tax system），包括儿童福利免税、儿童税收津贴、儿童税收抵免。由于 OECD 官方自 2022 年起不再单列该项均值，图 1 数据截至 2021 年。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OECD），https://www.oecd.org/en/data/indicators/family-benefits-public-spending.html。

从福利国家视角看，照顾作为其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主要体现了政府对弱势群体提供支持保障以及满足基本需要的责任，亦可作为研判福利国家质量和深度的重要依据（Anttonen & Sipilä，1996；Daly & Lewis，2000）。由此，福利国家在照顾事务中的角色问题与责任承担凸显出来。学者对照顾的分析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女性生活经历的微观视角，而是力图通过照顾活动的分析呈现出关于个人需要与福利状况的社会政策安排的一般性特征。进入 21 世纪，随着福利国家中社会照顾功能的不断强化，学者亦逐渐将研究视角拓展至更为宏观的制度与政策层面。这一转向推动了社会政策研究范式的调整与深化，围绕照顾责任的分配、制度化形式及其社会后果展开的研究，成为照顾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议题，并为理解福利国家的结构特征及其变迁开辟了新的研究空间。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三、作为一种社会政策研究新范式的社会照顾

（一）社会照顾的概念与分析框架

20 世纪末，学者从不同角度切入对照顾进行研究，难免带来了照顾概念使用的混乱（Anttonen & Sipilä，1996）。托马斯指出，照顾概念的使用涉及照顾提供者和接受者的身份、二者之间的关系、照顾的社会性内涵、所涉及的关系和劳动的经济特征、照顾发生的制度环境五个维度，并认为，只有依托特定的理论视野，才能对照顾做出确切的分析（Thomas，1993：651-653）。早期研究主要借助照顾概念呈现女性的生活经验，未能充分发展其作为分析范畴的潜力，照顾议题也因此未在更宽广的福利国家政治经济学中得到足够探索。戴丽和刘易斯进一步指出，既有研究对照顾概念的使用较为碎片化，主要表现为正式与非正式照顾、儿童与依赖性成人（特别是老年人）照顾、无偿与有偿照顾之间的割裂（Daly & Lewis，2000：285）。为增强这一概念的连贯性与综合解释力，她们将照顾建构为福利国家研究的一个分析范畴，提出“社会照顾”（social care）并将其界定为“满足依赖性成人与儿童身心需求的活动与关系，以及这些活动与关系所处的规范、经济与社会框架”（Daly & Lewis，2000：285）。根据两位学者的解释，社会照顾是一个多维度且动态的概念，其中有三个维度值得强调：

其一，将照顾视为劳动。这一视角不仅强调照顾作为行动过程及照顾者的主体地位，也促使研究者将其与其他劳动形式相比较，关注照顾的劳动条件，以及有偿 / 无偿、正规 / 非正规等边界问题，并凸显福利国家在界定这些边界中的作用。其二，将照顾置于义务与责任的规范性框架中。照顾往往源于社会或家庭关系，因而不能仅从劳动角度理解，还需关注其社会与伦理属性，以及国家在强化或弱化既有照顾规范中的角色，这也使照顾话语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其三，将照顾视为一种消耗经济与情感成本，并跨越公私领域边界的活动。核心问题在于这些成本如何在个人、家庭与更广泛的社会之间分配。

戴丽和刘易斯还认为，“社会照顾”概念主要具有三方面贡献：第一，它为社会政策的性别维度提供了解读框架。这使研究者能够从社会学视角考察社会政策为何以及如何被性别化，并将家庭政策、老年照顾政策以及福利资源在性别间的差异性分配纳入同一分析视野。由此，社会照顾超越了单一政策领域的限制，展现出较强的议题整合能力。尽管该概念最初源于性别视角，但其理论意义并不局限于性别研究，也有助于拓展福利国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第二，它有助于克服福利国家研究中对现金福利与服务供给的割裂分析，以及对后者的相对忽视。社会照顾视角促使研究者超越对单一政策工具的关注，转而理解福利制度中不同供给形式之间的关联，从而推动更具系统性的分析框架。第三，它能够捕捉当代福利国家的变迁轨迹。既有解释往往将福利国家变迁的动力归因于市场，却相对忽视了国家在主动塑造制度转型中的多重角色。从社会照顾视角看，国家并非只是外部环境变化的被动回应者，同时也是推动福利制度转型的重要行动者（Daly & Lewis，2000：296）。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二）社会照顾何以成为社会政策研究的新范式

在前文对社会照顾概念及其分析框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希望进一步阐述社会照顾如何由最初的分析范畴逐渐发展成为社会政策研究范式，并据此回答其何以具有范式意义。

范式（paradigm）作为科学哲学意义上的学术概念，主要通过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得到系统阐释（Kuhn，1970）。范式体现了特定科学共同体共享的基本承诺，它界定了一个研究领域关注什么问题、如何提出问题以及依据何种规则解释经验现象（Kuhn，1970；Ritzer，1975）。故分析范畴只有在能够持续界定研究对象、组织核心问题并形成相对稳定的解释路径时，才具有范式意义。库恩以“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与“例外”（anomaly）解释范式的发展：前者指学术共同体在既有范式所提供的世界观、研究纲领和成功范例指导下持续推进研究；后者则指超出现有理论预期、难以被既有框架解释的经验发现。当例外现象不断积累并削弱既有范式的解释力时，由此引发的所谓“危机”便会推动理论创新，并为新范式的形成创造条件（Kuhn，1970：80）。本文借用这一逻辑，反思福利国家研究中既有分析框架的解释边界与局限如何显现，以及新分析框架如何形成，并进一步从三个层面考察社会照顾的范式意义：本体论上是否扩展了福利国家研究的对象；认识论上是否形成了围绕福利供给、社会保护以及照顾责任配置的问题意识；方法论上是否形成了连接宏观制度与微观照顾实践、能够持续用于经验研究的分析路径。

社会照顾由分析范畴向研究范式的发展可被大体归纳为三个阶段：首先，从照顾视角反思具有“常规科学”主要特征的经典福利国家研究，揭示其对照顾劳动、家庭责任与性别化分工的长期忽视；其次，随着女性劳动参与、家庭结构和照顾需求的变化，大量未充分进入劳动力市场却持续承担无偿照顾与社会再生产责任的经验事实，与以正式就业、社会保险和去商品化为中心的分析前提之间逐渐形成张力，并呈现为既有框架难以充分解释的“例外”，由此推动研究者重新审视传统福利国家研究的解释边界；最后，围绕照顾需要、照顾劳动与责任配置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问题意识、核心概念和分析路径，并推动福利国家研究发生相应的理论重构。按照新范式通过确立相对独立的理论地位与学术合法性、进而获得学术共同体认同的一般发展逻辑（崔伟奇、史阿娜，2011），社会照顾也由此超越了一般分析范畴的功能定位，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为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社会政策研究范式，进而与社会保险范式在不同问题领域形成并存与互补关系。

1. 常规科学与经典福利国家研究

回顾福利国家与社会政策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这一领域的经典研究曾一度集中在国家与劳动力市场、工作与福利保障之间的关系上。这一取向与福利国家兴起于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扩张、国家财政能力提升，以及劳资冲突、工人阶级组织化和社会矛盾的制度化调适密切相关（Esping-Andersen，199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贝弗里奇革命”进一步推动国家福利责任的制度化，使“福利国家”概念逐渐流行，并促使分散、慈善化和低水平的社会救助转向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Briggs，1961）。比较分析方法的发展随后推动了福利国家研究的深化。威伦斯基与莱博依据国家福利责任的范围，将福利国家区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剩余型”和以瑞典为代表的“制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度型”：前者仅向少数弱势群体提供有限救助，后者则通过制度化安排保障全体居民（Wilensky & Lebeaux，1965）。蒂特马斯进一步从国家角色、政策优先事项、福利接受者地位及政治立场等维度，提出制度化再分配、工业成就和剩余三种模式的福利国家类型（Titmuss，1974）。20 世纪 90 年代，埃斯平 – 安德森在此基础上整合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三种福利国家世界”，进一步巩固了以劳动力市场为中心的比较研究范式（Esping-Andersen，1990）；由于该类型学建立在经验数据而非意识形态划分之上，其重要贡献之一是提出“去商品化”概念，以衡量劳动者摆脱市场依赖、享有社会权利的程度，此后持续影响着一系列福利国家比较研究，并获得了学术共同体的广泛认同。

从库恩的科学发展观来看，上述研究传统呈现出“常规科学”的主要特征，研究者围绕相对稳定的问题意识、概念工具和研究范畴持续推进知识积累与理论精细化。在这一过程中，基于收入再分配理念的社会保险逐渐成为经典福利国家研究的重要制度基础和分析对象，并逐步被确立为一种社会政策研究范式。在制度设计上，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意味着福利给付从“恩惠”转向“权利”，这也是福利国家逐步走向成熟的关键标志（武川正吾，2011：259）。从研究角度而言，这一范式主要关注资本主义制度环境下福利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这种干预发展成为以社会保险制度（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为主体的系统性社会政策。作为一种建立在国家与市场关系之上的研究范式，社会保险引导学者关注处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男性）有偿劳动者，思考的是这些劳动者背后的社会阶级关系的调整，提出的理论方案是通过去商品化来解决劳动者的市场依赖问题。沿着这一范式，主流福利国家研究长期偏向社会保险，重点考察了福利国家干预劳动力市场的角色与作用，并在埃斯平 – 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理论中达到高峰，标志着福利国家比较研究由早期类型划分走向系统化和成熟化。

然而，上述经典福利国家类型学分析主要围绕正式就业者的收入保障展开，典型分析主体也往往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有偿劳动者。在这一以社会保险与劳动力市场为中心的分析框架中，照顾活动及其性别化分工长期处于福利国家研究的边缘位置。在福利国家扩张的“黄金时代”，该理论盲点尚未得到充分揭示，也由此构成后来照顾研究反思既有分析框架的起点。

2.“例外”显现与照顾视角的反思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家庭结构、女性就业和社会风险形态发生变化，经典范式在解释照顾需求、性别不平等及新社会风险方面的局限逐渐显现（Pierson，1996；Taylor-Gooby，2004）。这一现实困境引发了不同理论流派的反思，特别是在关注“照顾”议题的学者看来，经典福利国家研究存在着两大局限：第一是缺乏性别视角，或者说存在着“性别盲区”（Sainsbury，1996；Leitner，2003）。以“去商品化”为例，其前提是个体已充分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主要依靠有偿就业获得收入和社会保障。然而，在传统工业社会中，男性多为受薪就业者；女性则更多承担家庭内部无偿照顾责任，女性未充分“商品化”却承担大量社会再生产劳动的现实因而容易被遮蔽。莱特纳据此对埃斯平 – 安德森以劳动力市场参与和去商品化为核心的福利体制分析视角提出了批判性反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思；她指出，若福利体制研究过度聚焦国家、市场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便会弱化家庭作为照顾主体的制度角色及照顾责任的性别化分配问题（Leitner，2003：354）。第二个质疑与第一个有关，即针对男女性别固化分工的潜在假设。在“男性养家模式”下，男性被视为从事有偿生产劳动的市场主体，女性则被默认承担无偿家庭照顾责任。然而，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相互依赖、难以分割，私人领域的家庭照顾活动与公共领域的社会政策一样，都是劳动力商品化的重要保障（武川正吾，2011：31）。男性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并获得相对“独立”地位，不仅依赖福利国家制度，也需要女性无偿照顾劳动的支持。因而，“去商品化”概念忽视了照顾劳动对劳动力市场运转的基础性作用、照顾者的福利获取问题及照顾服务的社会价值（Leira，2002）。

正是在对上述两大局限的反思中，照顾逐渐进入比较社会政策研究，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发展为社会政策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构成理解福利国家发展与变迁的重要议题（Daly & León, 2022）。起初，安托宁和西皮莱（Anttonen & Sipilä，1996）、圣斯伯瑞（Sainsbury，1996）、弗雷泽（Fraser，1997）等学者都陆续尝试提出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的修正或替代模型。尽管埃斯平 – 安德森在引入“去家庭化”概念、重新审视福利国家体制后，仍坚持原有类型划分的有效性（Esping-Andersen，1999），但其他学者的研究却进一步突破了以劳动力市场为中心的分析框架。例如，莱特纳重点考察了养老与托育需要的满足及照顾供给，提出四种家庭主义类型，以补充原有的“三个世界”模型（Leitner，2003：358）。进入 21 世纪，相关研究逐渐将照顾责任的制度配置作为重要议题，考察国家政策如何重塑家庭照顾及不同照顾供给方式，并以家庭化与去家庭化、正式与非正式照顾等维度分析不同制度安排（Bettio & Plantenga，2004；Kremer，2007；Saraceno & Keck，2010）。近年的研究进一步将阶级、代际关系和制度位置纳入照顾关系的分析，并强调从福利混合经济与社会不平等的视角理解照顾的意涵与实践（Peterie & Broom，2024）。这些研究围绕“照顾”逐渐形成较为丰富的概念工具和比较研究成果，持续深化了对社会保险范式的反思，拓展了福利国家研究的对象与问题意识，也使照顾活动及国家干预照顾的制度角色得到更多关注。由此，Daly 和 Lewis（2000）提出的社会照顾概念框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延续和拓展，并逐步积累起社会照顾由分析范畴走向社会政策研究新范式所需的理论条件与学术基础。

3. 比较视角下的经典社会保险范式与新兴社会照顾范式

如前所述，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经典福利国家研究呈现出库恩所指出的“常规科学”的若干主要特征，而照顾劳动、家庭责任与性别化分工所呈现出的经验事实，则逐渐暴露出这一分析框架的解释边界，使“例外”显现。受传统性别分工限制和生理差异的影响，劳动力市场主体以及社会保险制度的受益人以男性为主，女性的福利获得、劳动参与及与家庭成员之间的照顾依赖关系难以被以商品化和去商品化为中心的框架充分解释。僵化的性别分工假设使社会保险范式无法包容在福利国家实践中日益重要的照顾活动及其政策，因而也不能对社会政策总体效益做出全面的分析（Orloff，1993）。

根据库恩的说法，当持续无法解决某个引人瞩目的难题并由此引发危机之后，对范式的检验便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发生在两个竞争范式争取科学共同体认同的过程中（Kuhn，1970：145）。相对应的，经典福利国家研究中的社会保险范式长期未能充分解释性别分工、无偿照顾及照顾依赖等问题，并逐渐显露出局限。社会照顾研究则围绕这些被既有范式忽视的问题，开始重新检视经典社会保险范式的研究对象和解释边界。女性主义学者推动福利国家研究从侧重社会生产逐步拓展至社会生产与社会再生产并重，并将长期被置于家庭私人领域的照顾活动纳入社会政策分析，为社会照顾发展为相对独立的研究范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分析空间。由此所形成的不同问题意识、分析对象与解释框架，使社会性别关系调整以及福利国家在回应照顾依赖中的角色得到进一步关注，构成了 20 世纪后期社会照顾视角研究与经典福利国家研究之间较为集中的理论争论与范式竞争。有必要指出的是，女性主义对以社会保险为中心的福利国家理论的批评，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保险主要惠及男性、救助主要面向女性”的二元对立。

“社会照顾”经由以戴丽和刘易斯为代表的学者的推动，由描述照顾活动的概念发展为具有范式意义的福利国家分析框架，用以解释照顾责任的配置及其变迁。该框架所凸显的照顾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对传统社会保险范式较难充分处理的社会再生产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而对于收入中断、劳动力市场依赖等问题，社会保险范式仍具有重要解释力。社会照顾的发展体现了既有研究框架解释边界的显现及由此引发的知识重构：在本体论层面，它将父权制环境中的无偿照顾者及其所处的家庭和性别关系纳入福利国家分析，扩展了以有偿劳动、收入保障和社会风险为中心的传统研究对象；在认识论层面，它将研究问题进一步延伸至照顾责任如何在国家、社会、市场与家庭之间配置，以及这种配置如何影响照顾者与被照顾者的福利获得；在方法论层面，围绕照顾体制、家庭主义等形成的比较研究，逐渐建立起连接宏观制度安排与微观照顾实践的分析路径（Daly & Lewis，2000；Leitner，2003；Saraceno & Keck，2010）。故本文有理由认为，社会照顾已经突破一般分析范畴的边界，并具有与经典社会保险研究相并立的范式意义。

从库恩关于范式变迁的意义上看，社会照顾也可被理解为一种“新候选范式”（new candidate for paradigm）[①]，其与主流的社会保险范式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异：从研究假设看，社会照顾范式引入了性别视角，将福利国家置于资本主义制度与父权制结构交织的环境中加以考察，指出福利国家在推动去商品化的同时，也可能再生产性别不平等；从研究问题看，它关注照顾依赖问题，即被照顾者对照顾者，尤其是女性照顾者的依赖，以及家庭成员对女性无偿照顾劳动的依赖，并由此反思既有社会性别关系与分工格局；从研究对象看，它关注处于依赖状态的成人与儿童，以及为其提供照顾的群体（尤其是女性）。总之，社会照顾范式对社会保险范式在多维度上的突破进一步推动

① 根据库恩的论述，当一个“新候选范式”首次被提出时，它很少能解决它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而且大多数解决方案仍然远远不够完美；如果原有的科学共同体或那些只看重“相对解题能力”的理性务实之人要求一个“新候选范式”从提出之初就必须在整体问题解决能力上全面超过旧范式，那么科学史上几乎就不会发生什么重大革命（Kuhn，1970：156-157）。本文据此将“新候选范式”理解为：在既有范式因关键难题而受到质疑时出现，能够提出新的问题意识与解决方向，但尚未在整体问题解决能力上全面超越旧范式的竞争性框架。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了社会政策学术领域的研究进展（见表 2），它揭示并承认了与社会生产并行的另一面——社会再生产的重要价值。

表 2 社会保险范式与社会照顾范式的比较

维度 \ 范式	社会保险	社会照顾
理论基础	社会保障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福利国家理论等	女性主义理论、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照顾伦理（ethics of care）理论等
理论路径	国家与市场关系下的公民身份	国家、市场、社区与家庭关系下的公民身份
研究假设	福利国家处于资本主义环境下	福利国家处于父权制环境下
研究问题	解决市场依赖问题（去商品化）	解决照顾依赖问题（去性别差异化、去家庭化）
研究对象	劳动市场中以男性为主的“正式就业者”（formal workers）	无偿照顾者（以女性为主）以及接受照顾的儿童、老年人（或需要接受照顾的弱势群体）
研究目的	调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关系	调整父权主义制度下的社会性别关系
政策工具	以收入维持为目的的现金给付（如养老金、失业金、医疗保险等）	现金、时间与服务（甚至道德与情感）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回顾福利国家的演变脉络不难发现，诸如公共卫生、教育、失业与工伤保险、社会救济以及劳动就业等主要政策领域，无一不与劳动力市场紧密相连，其内在逻辑大多围绕劳动力商品化及其社会风险调节的治理命题展开。正如房莉杰（2024）所指出的，社会政策贯穿劳动力进入、参与和退出市场的全过程：在进入市场之前，通过教育、医疗和就业服务等政策进行社会投资，以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潜在劳动力；在市场运作之中，依托劳动保护与社会性规制缓解劳动商品化所带来的风险；而在退出市场之后，则借助社会保障制度降低个体对市场收入的依赖，实现不同程度的去商品化。可以说，社会保险范式的分析重心是劳动力市场“中”阶段的风险保障问题，并延伸至“后”阶段的收入维持；而社会照顾范式则更多解释了劳动力市场“前”阶段的照顾与再生产条件，同时延伸至“后”阶段的长期护理、养老服务等需求。故社会保险范式与社会照顾范式虽同属福利国家研究领域，但二者在问题意识、分析对象与解释路径上存在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脉络。

社会科学中的经典研究及其成果通常不具有绝对排他性，反而可能与其他研究路径及其发现相互兼容、彼此补充（崔伟奇、史阿娜，2011）。Ritzer（1975：165）关于社会学多范式并存的讨论，亦为本文理解社会政策研究中不同范式的并存提供了启发。因此，本文提出社会照顾作为社会政策研究的另一种范式，并非意在取代社会保险范式，而是旨在强调二者的互补关系，以勾画出一幅完整的社会生活图景。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四、社会照顾范式下的“一老一小”照顾问题回应与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发展为中国农村妇女创造了更多非农就业机会，不仅缩小了家庭收入贡献中的性别差距，也提升了妇女在家庭中的相对地位（Bian，2002）。在劳动力市场需求与自我价值实现的双重推动下，女性参与有偿劳动已趋常态化。但落合惠美子指出，东亚普遍存在一种家庭主义福利制度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混合型照顾体制”，即制度上虽引入长期护理保险等社会保险安排，但文化与实践中仍高度依赖女性和家庭的“再家庭化”支持。近年研究也表明，女性依然承担主要的无偿照顾和家务劳动，而这种不平等分工会进一步限制其就业参与、工作时长和职业发展机会（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2018；刘成奎等，2023）。将视角聚焦本土，我国“一老一小”照顾问题受儒家传统文化和“男主外、女主内”观念影响，往往被置于家庭内部加以应对，且照顾角色仍构成社会评价女性的重要依据。然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以家庭为中心、依赖女性的照顾模式正面临日益突出的结构性约束：育儿与教育支持对时间和精力的要求不断提高，人口寿命延长与慢性病普遍化持续增加老年照顾压力，而国家在相关领域的干预不足或不当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岳经纶、颜学勇，2013）。由此，我国女性劳动者同样陷入了默德尔与克莱恩所称的“双重角色”（dual role）困境（Myrdal & Klein，1956）。

经典福利国家研究以及社会保险范式对照顾问题的解释存在明显局限，这一理论盲点在当前中国语境下同样存在。因此，有必要引入照顾视角，并重新审视照顾责任分配以及老年照顾与儿童照顾之间的内在关联：一方面，社会照顾范式的提出，论证了国家对照顾活动进行干预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也为理解“一老一小”这一本土照顾需要提供了超越个体与家庭层面的分析路径。近年来，国家不断放宽生育政策并出台多项鼓励生育举措，释放出劳动力短缺与人口老龄化加速的信号，使同时承担育儿与养老责任的家庭情况日益普遍。与此同时，房价、医疗、物价和其他生活成本的不断攀升，又进一步加重了家庭的经济与照顾压力。这一状况与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在整体设计上的不足密切相关，制度与政策的缺失及其内在冲突，使中国家庭在惯性作用下继续承接并消化了大量本应由公共体系承担的外溢性成本（彭希哲、胡湛，2015）。这意味着，与西方国家社会照顾研究较多关注家庭照顾责任中的性别权利冲突相比，中国当前更为突出的结构性张力在于公共照顾责任不足背景下家庭照顾负担不断加重与现实照顾能力持续削弱之间的矛盾。我国“一老一小”问题的集中显现，并非源于家庭责任意识弱化，而是家庭照顾能力与现实照顾需要之间张力扩大的结果，并嵌入更深层的性别结构与代际错位之中（李磊等，2022）。当家庭已难以独立应对不断增长的照顾需求时，国家通过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介入照顾活动，便具有了相应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社会照顾范式及相关论述为关联考察儿童照顾与老年护理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戴丽与刘易斯明确指出，既往研究存在将儿童与成人（尤指老年人）照顾割裂开来的碎片化问题；两类群体的照顾虽从表面看指向不同对象和特征，但在社会照顾分析中不宜分割，且二者在现实制度与家庭实践中日益交织（Daly & Lewis，2000：285-286）。这里所说的关联，并不意味着养老与育儿责任在所有家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庭中必然同时发生，而是需要从全生命周期和全家庭视角加以统筹，强调二者会通过代际支持、家庭资源调配与公共责任安排相互影响（石燕、陈友华，2025）。基于这一范式，社会照顾作为维系社会运行与代际再生产的基础性活动，其责任归属应具有明确的公共属性和制度指向，在养老与托育两个领域的服务供给不宜再被处理为彼此孤立的政策领域。

这一理论判断与范式引入也与当前中国人口发展和社会政策转型的现实背景相契合。2026 年 3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在第十一篇“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中提出，要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并优化提升“一老一小”服务；相关部署涉及养老机构提质增效、医养结合能力提升、普惠托育扩容提质等内容。在现有中国“照顾”语境中，老年与儿童照顾往往相互交织，并在同一家庭生命周期中叠加，衍生出时间挤压、性别不平等等结构性问题。故“一老一小”已正式成为需要通过公共政策系统回应的重要社会议题，“十五五”时期人口相关规划的主题主线与重点内容已逐步明确（蔡昉，2025）。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老一小”问题治理，立足于全生命周期视角并以国家有效干预和照顾责任再配置为主线，推动家庭内部承担的照顾责任转向多元主体共同分担，与社会照顾范式的本质内涵具有内在契合性。

五、结语

正如奇塔所言，每个人都会经历脆弱的幼年、老年、疾病或不幸时刻，因而照顾具有不可避免性（Kittay，1999：29）。此时，照顾不再只是个体意义上的福利依赖，而是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平等且相互依赖的关系。国家在推动社会照顾政策时，不应仅局限于女性作为照顾者的性别视角，而应承认照顾责任本身的社会价值，并确立“任何社会都是提供照顾与接受照顾的社会”这一基本理念（Nussbaum，2003：51）。故在关乎亿万家庭福祉的“一老一小”的具体照顾问题上，社会照顾因其贯穿人类全生命周期的固有属性，天然地构成了本土推动养老育幼事业并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理论根基。

当前，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政策重心依然集中在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而社会照顾领域的政策设计明显滞后，具有普惠性的家庭政策更是缺乏。社会照顾范式，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为本土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如何提供照顾”不仅是一种情感性的关切，更应被视为政治与政策改革的重要目标。这一视角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与促进养老托育政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洞见，也提示我们在制度建设中，应将社会照顾纳入与社会保险同等重要的议程，以推动福利体系的全面发展与均衡进步。

最后，本文所提出的将社会照顾作为社会政策研究的一种新范式的主张或存在一定局限。一是关于社会照顾范式内部必须面临的关键分歧。在承认国家对照顾事务进行制度性介入的正当性之后，合理的干预形式为何，从事照顾劳动的女性应如何获得相应的社会权利保障，仍存分歧。尽管“有偿”可以为照顾者（多数为女性）提供经济上的解放，但一些学者认为，这并未充分改变以女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性为主导的传统家庭分工，反而构成了所谓“爱和金钱对立的世界”中家庭照顾者对自我身份的认知迷失（Stacey & Ayers，2012）。这正是帕特曼所揭示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困境”（Wollstonecraft's dilemma）：女性追求平等公民身份时，究竟应通过进入以男性有酬劳动者为标准的公共领域来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权利，还是应基于女性在照顾孩子、履行母职和家庭责任中的特殊贡献而获得社会承认与制度支持？（Pateman，1988）由于这一问题牵涉宗教信仰、传统文化、性别与家庭价值观以及社会阶级力量结构等深层因素，其制度回应呈现出高度复杂性，也构成了欧洲各国社会照顾政策差异的根本原因。[①]因此，基于社会照顾范式来考察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时，仍需立足于本国的现实国情，来判断我们需要何种社会照顾策略。二是源自经典范式与原有科学共同体的外部质疑。这是因为新范式在刚出现时，通常并不会在所有问题上都比旧范式解释得更好，甚至会丧失旧范式原有的一部分解释能力（Kuhn，1970）。严格来说，无论在发展历程还是成熟程度上，社会照顾在理论积累、研究范畴与共同体认同等层面，均难与社会保险这一经典范式相比，短期内也更不可能达成所谓的彻底范式转换。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通常难以形成结构稳定、共识广泛且拥有统一成功范例的学术共同体；范式的特殊意义也不只体现在理论解释上，更在于其作为科学成就积累与革命性变迁的基本单位（崔伟奇、史阿娜，2011）。据此，社会照顾的范式价值并不取决于其能否完全取代社会保险，而在于其能否开辟新的问题领域与解释路径，尤其是如何针对社会保险这一经典范式所带来的局限进行有益补充。因此，本文将社会照顾视为社会保险范式之外的一种新社会政策研究范式，旨在拓展对现代福利国家制度运行及其变迁的理解，并以此审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探索如何以家庭为基本单元，更加精准、有效地回应全生命周期中的“一老一小”照顾需要。

参考文献：

蔡昉，2025，《谋划“十五五”时期人口高质量发展需关注的几对关系》，《清华金融评论》第 3 期。

崔伟奇、史阿娜，2011，《论库恩范式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运用的张力》，《学习与探索》第 1 期。

房莉杰，2024，《反思自由：社会政策的存在价值与演化逻辑》，载周飞舟主编《北大社会学刊》第 4 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顾严，2024，《面向高质量发展的“一老一小”政策》，《探索与争鸣》第 9 期。

李磊、莫淼鑫、李连友，2022，《挤压、失衡与弥合：“一老一小”家庭照料功能的演变及重塑》，《学习与实践》第 8 期。

刘成奎、林晓丹、王浩，2023，《家庭责任、工作时间与性别收入不平等》，《劳动经济研究》第 2 期。

彭希哲、胡湛，2015，《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中国社会科学》第 12 期。

石燕、陈友华，2025，《生命周期赤字理论视角下“一老一小”问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第 1 期。

① 经合组织与欧洲议会的相关报告呈现出不同的政策取向。前者支持维持照顾者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并保证他们享受基于工作权利的照顾时间，如（陪）产假、亲子假期、兼职工作机会等；后者则更强调承认家庭非正式照顾的社会价值，通过类似薪金的给付、养老金及其他基于照顾活动的社会权利予以补偿，并将照顾结束后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保障纳入其中。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武川正吾，2011，《福利国家的社会学：全球化、个体化与社会政策》，李莲花、李永晶、朱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岳经纶，2022，《卷首语 积极发展养老托育福利事业，推动社会政策的社会照顾范式转移》，《中国公共政策评论》第 1 期。

岳经纶、范昕，2018，《中国儿童照顾政策体系：回顾、反思与重构》，《中国社会科学》第 9 期。

岳经纶、方萍，2017，《照顾研究的发展及其主题：一项文献综述》，《社会政策研究》第 4 期。

岳经纶、颜学勇，2013，《工作—生活平衡：欧洲探索与中国观照》，《公共行政评论》第 3 期。

Adema, W., Fron, P., & Ladaique, M. 2011, "Is 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 Really More Expensive? Indicators on Social Spending, 1980-2012; and a Manual to the OECD Social Expenditure Database (SOCX)." OECD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s No. 124.

Anttonen, A., & Sipilä, J. 1996, "European Social Care Services: Is It Possible to Identify Models?"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6 (2).

Bei, E., Albertini, M., & Toth, F. 2026, "Policies for Supporting Caregivers of Older Adults with Long-Term Care Needs in EU Countries: A Systematic Review." *European Journal of Ageing* 23.

Bettio, F., & Plantenga, J. 2004, "Comparing Care Regimes in Europe." *Feminist Economics* 10 (1).

Bian, Y. 2002,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 (1).

Briggs, A. 1961, "The Welfare 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2 (2).

Ciccia, R., & Sainsbury, D. 2018, "Gendering Welfare State Analysis: Tensions between Care and Paid Work."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Gender* 1 (1-2).

Daly, M., & Lewis, J. 2000, "The Concept of Social Care and the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Welfare State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 (2).

Daly, M., & León, M. 2022, "Care and the Analysis of Welfare States," in K. Nelson, R. Nieuwenhuis, & M. A. Yerkes (eds.), *Social Policy in Changing European Societies: Research Agendas for the 21st Centur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Deacon, A. 2007, "Civic Labour or Doulia? Care, Reciprocity and Welfare." *Social Policy and Society* 6 (4).

Eggers, T., Grages, C., & Pfau-Effinger, B. 2024, "Gender and Policies on Paid Family Care: Overview of Debate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Journal of Family Research* 36.

Esping-Andersen, G.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Esping-Andersen, G. 1999,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raser, N. 1997, *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Geissler, B., & Pfau-Effinger, B. 2005, "Change in European Care Arrangements," in B. Pfau-Effinger & B. Geissler (eds.) *Care and Social Integration in European Societies*. Bristol: Policy Press.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8, *Care Work and Care Jobs for the Future of Decent Work.*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Kittay, E. F. 1999, *Love's Labor: Essays on Women, Equality, and Dependency.* New York: Routledge.

Kolberg, J. E. 1991. "The Gender Dimens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21(2), 119-148.

Kremer, M. 2007, *How Welfare States Care: Culture, Gender and Parenting in Europe*.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Kuhn, T.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sch, C. 1977, *Haven in a Heartless World: The Family Besieged*. New York: Basic Books.

Leira, A. 2002, *Working Parents and the Welfare State: Family Change and Policy Reform in Scandinavia.* Cambridge: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itner, S. 2003, “Varieties of Familialism: The Caring Function of the Famil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uropean Societies* 5 (4).

Lewis, J. 1992, “Gend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Regimes.”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 (3).

Lewis, J. 1997, “Gender and Welfare Regimes: Further Thoughts.”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 Society* 4 (2).

Myrdal, A., & Klein, V. 1956, *Women's Two Roles: Home and Work.*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Nussbaum, M. C. 2003, “Capabilities as Fundamental Entitlements: Sen and Social Justice.” *Feminist Economics* 9 (2-3).

Orloff, A. S. 1993, “Gender and the Social Rights of Citizenship: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ender Relations and Welfare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 (3).

Pateman, C. 1988, “The Patriarchal Welfare State,” in A. Gutmann (ed.), *Democracy and the Welfare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eterie, M., & Broom, A. 2024, “Conceptualising Care: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Informal Care and Inequality.” *Social Theory & Health* 22 (1).

Pierson, P. 1996,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World Politics* 48 (2).

Ritzer, G. 1975, “Sociology: A Multiple Paradigm Science.”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10 (3).

Rummery, K., & Fine, M. 2012, “Care: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ory, Policy and Practice.”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46 (3).

Sainsbury, D. 1996, *Gender, Equality and Welfare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raceno, C., & Keck, W. 2010, “Can We Identify Intergenerational Policy Regimes in Europe?” *European Societies* 12 (5).

Siim, B. 1994, “Engendering Democracy: Social Citizenship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or Women in Scandinavia.”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 Society* 1 (3).

Stacey, C. L., & Ayers, L. L. 2012, “Caught between Love and Money: The Experiences of Paid Family Caregivers.” *Qualitative Sociology* 35 (1).

Taylor-Gooby, P. 2004, “New Social Risk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Some Evidence on Responses to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ies from Eurobaromete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 57 (3).

Thomas, C. 1993, “De-constructing Concepts of Care.” *Sociology* 27 (4).

Titmuss, R. M. 1974, *Social Polic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llen & Unwin.

Ungerson, C., & Yeandle, S. (eds.). 2007, *Cash for Care in Developed Welfare Stat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Wilensky, H. L., & Lebeaux, C. N. 1965, *Industrial Society and Social Welfare.* New York: Free Press.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picture of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prosperity within the same chain, and clarifies the closed-loop logic by which action outcomes reinforce cyclical momentum through material feedback, recognition feedback, and meaning regeneration. It then systematically explains the foundational position and full-chain function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in driving spiritual prosperity. The core argument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is the foundational interface of the supply system for spiritual prosperity; the fairness of distribution institutions profoundly affects the extent and upper limit of the spiritual world. Secon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carries multidimensional spiritual values, and its institutional design directly affects the internalization efficiency of spiritual resources, the integration effectiveness of spiritual strength, and the output level of spiritual energy throughout human development. Thir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should achieve three-dimensional optimization through "physical" articulation of fields, "chemical" integration of mechanisms, and "ecological" connection of systems, thereby transforming the strategy of "investing in people" into sustained momentum for individual development.

The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Investing in People" and Its Social Welfar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Gu Tian'an, Xu Fuhai 33

Abstract: "Investing in peopl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orientation in China's macro policy and social policy, and its indigenous theoretical basis and institutional logic urgently require systematic explanation. Using conceptual history tracing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by which traditional welfare thought transforms into modern social welfare. The study finds that traditional life care, holistic human cultivation, family-state responsibil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ntinuity enter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welfare system through modern transformation in three dimensions: value, subject, and time. In the value dimension, ethical care expands into rights protection and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In the subject dimension, family-state responsibility is reconstructed into multi-actor collaboration under Party committee leadership, government guidance, and clea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time dimension, intergenerational continuity develops into a whole-life-cycle policy for all people. Accordingly,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three-dimensional mechanism for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and defines "investing in people" as an indigenous analytical category that links social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empowerment and explains China's social welfare practice.

Social Care: An Emerging Paradigm in Social Policy Research

Yue Jinglun, Wang Zhenyu 46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s th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and children has risen to an important national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policy concern, it has gradually spilled over from the private family sphere and become a public issue that social policy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must addres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insight from Western care research is that it criticizes traditional welfare state theory for neglecting the gender perspective and its implicit assumption of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r, and points out that mainstream social policy focuses excessively on state-market and labor-welfare relations while ignoring the value of family care itself and the rights protection of those who bear such responsibilities, mainly women. As an emerging paradigm in social policy research distinct from but not mutually exclusive with social insurance, social care points the way toward rethinking the boundaries of welfare institutions and care responsibilities,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lderly and childcare policies. Its policy significance is even more prominent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increased social mobility and intensified population aging and low fertility.

Assessment of the Universality and Affordability of Childcare Services in EU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Fan Xin, Pang Ziyue, Li Minyi 63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low fertility, developing childcare services has been placed on the policy agenda as an important fertility support polic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universality and affordability of childcare services in 12 EU countries. Using data from public databas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employing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it assesses the levels of universal and affordable provision of childcare services in these countries and explores the main pathways to achieving universality and affordability. The study finds that both highly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nd less economically developed countries may achieve universal and affordable childcare service provision, and that different pathways exist for achieving universality and affordability.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analyzes possible pathways for constructing a universal and affordable childcare service system in China and provid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a's childcare service development.

The Impact of Care Commodification and Care Relationships on the Elderly' Subjective Well-Be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the Disabled Elderly in Guangzhou

Wan Xuan, Huang Bohan 76

Abstract: There remains considerable theoretical debate over whether care commodification can improve individual subjective welfare, and related empirical research is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care ethics and using first-hand data from Guangzhou, this article empirically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